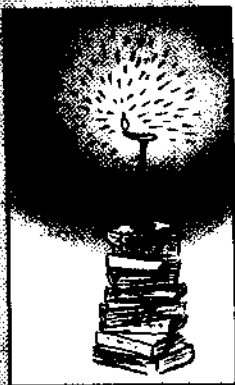


897

ck
w6

文池
主編



北大访谈录

主编 陈伯吹
副主编 陈伯吹
编委 陈伯吹
陈伯吹 陈伯吹
陈伯吹 陈伯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000



A09561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访谈录/文池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5004-3116-3

I. 北… II. 文… III.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

IV. G65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980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冰

封面设计 叁陆工作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8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语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哈佛大学陆登庭校长在讲话中说：人文学科是引领时代前进的火车头。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的时代，世界显得太过复杂，我们太易迷失，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普遍事实：保持清醒与理智的人将走在时代前列，思想和智慧将成为利器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比金钱等物质更加至关重要，而求教于专家、聆听学者的发言将是最有效最实惠的手段之一。

《中国学者访谈录》书系试图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构建一条读者与思想家交流与互动的途径，让更多的人融入思考、探索和交流的氛围之中。《中国学者访谈录》书系关注所有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现实性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话题，主张不拘一格、兼容并蓄、思想自由，提倡不蹈虚空、力求务实的态度，呼唤关注人类生存方式和精神意志的理性思考。为了避免学术界和知识界常见的枯燥、晦涩、“八股式”的行文，我们选择了“对话”这种方式，读者可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到思想所带给你的力量。你将看到访问者精心准备的极具代表性和针对性的发

问，而受访者独到的眼光、精辟的见解、敏锐的思维将让你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北大访谈录》是《中国学者访谈录》书系的第一辑，收有十二位北大学者的访谈，既有在学界享有盛誉、声名显赫的前辈，也有后来居上、意气风发的新锐。访谈内容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法律等现实性问题。由于北大深厚的学术传统和人文底蕴，北大学者的观点必将震撼你的心灵、开启你的心智，帮助你辨别虚实、去伪存真。

向与思想为伍与寂寞同行的读者致敬！

欢迎读者的批评，欢迎将您所关注的问题和您所读到的优秀访谈推荐给我们（E-mail: asnl@263.net）。

编 者

2001年9月

目 录

1/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
23/法治与法律家之治
39/漫谈刑诉文化
55/难以融合的中西文化
85/中国的家族、家庭与社会政治
103/通货紧缩与拉动内需
125/中国外交中的大国关系
145/中国农村基层下放权的运作方式
165/全球关注的三个人文问题
179/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嵌入
203/总存在着缺陷
241/异彩纷呈的春秋战国外交思想

受访者：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李 强

访问者：北京大学政治学系97级硕士研究生 杨旭日



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

——李强访谈录

【杨旭日】李强先生，大家知道您在西方政治哲学及韦伯研究方面造诣很深，我现在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不过，先还是请您谈谈您的学术历程。

【李 强】你说的这两个方面我都做了一些努力，还谈不上什么造诣。至于我的学术历程，大概是这样的，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读完小学、中学。“文化大革命”时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来，系里恢复办政治学专业，我成了那个专业恢复后的首届毕业生。本科毕业后，留系从事教学工作。后来考取了出国研究生，于198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94年回北大任教。

北大访谈录 II

我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都是在留学期间逐步形成的。开始在英国，就读于伦敦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由于我的导师去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我就跟着去了大学学院。在英国期间我专攻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英国的学术制度很严格，导师指定许多必读书目，读后写出读书报告，在小型的读书会交流和研讨。这些训练使我受益匪浅。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建议我把自己的背景和西方理论结合起来，那时读了汉学家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严复的著作，书中许多观点我不敢苟同。后来我就选严复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探讨严复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命运，并进一步思考中国自晚清以来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韦伯对传统中国有过很多

极为精辟的论述，这样很自然，我慢慢关注起韦伯来了。后来我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做访问学者，这时才系统钻研古典社会学，特别是韦伯的学说。在国外这些年的读书与研究经历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兴趣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西方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我曾写过若干文章，并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对这几年思考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梳理；关于韦伯的研究，与别人合作翻译了一些韦伯著作，我翻译的部分已收入《经济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书中，也写过一些文章；关于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在中文与英文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杨旭白】李先生，刚刚听到您提到您对自由主义做了很深的研究，您能否介绍一下有关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脉络和体系？

【李 强】这是一个很大而且较为复杂的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我对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理论脉络及其内在矛盾做了较系统的分析。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已深深植根于大众共同的政治、社会、经济态度之中。自由主义在我国学术话语中也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但人们总是比较随意地使用它，所以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混乱。我在分析自由主义时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包括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哲学自由主义几个层面的内涵。政治自由主义包括个人自由、宪政与法治、代议制民主等原则。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保障财产权利，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社会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正义。所谓哲学自由主义主要指许多自由主义理论背后的一套哲学理念，

特别是所谓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个人主义。

【杨旭日】李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自由主义的四个层面，并进一步提出自由主义已构成了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那么作为意识形态，这四种类型是否形成了一种具有统一性的东西呢？什么是其核心呢？

【李 强】作为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确具有某种统一性的内涵。我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其政治内涵。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享受法律保障下的权利，强调宪政与法治，主张有限政府，试图以多种方式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主张实现代议制民主等等。这些内涵是所有自由主义派别共同接受的。除此之外，对于自由主义的其他内涵而言，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会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有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诸方面可能彼此冲突，譬如，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人可能对社会自由主义持消极态度。

北大访谈录 1

【杨旭日】自由主义，一般来说，是一个外来词。它可能与保守主义构成一个维度，您觉得这一维度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如何？

【李 强】自由主义是一套价值观念，它不是解释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它本身构成一套政治、经济理念。自由主义作为一套价值系统是舶来品。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中国就没有自由主义的因素了。但是，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的因素很弱，没有像西方一样构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保守主义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有的学者以为，中国没有存在过作为一种理念、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在中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比，轮廓可能相对清晰一些，如晚清时期的严复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梁启超也具有

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胡适的自由主义也相当明显，有些海外学者甚至说胡适是中国惟一的自由主义者。

【杨旭白】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自由主义研究方面的成就？除了系统介绍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历史外，您自己是否对自由主义理论有所贡献？

北大访谈录 II

【李 强】我觉得，我关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系统梳理、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理论内涵及其受到的批评。这样的工作在国内还是首次进行。我国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政治思潮，不少人对自由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向往或激烈的批评。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出现过系统描述自由主义理论与历史的学术著作。我的关于自由主义的书尽管有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毕竟是从学术角度系统研究自由主义的著作，为学术界研究自由主义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其实，任何人在介绍、解释一种政治思潮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理解融入研究中。中国过去许多儒者在解释儒家经典时，就有所谓“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的说法。因此，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是具有相当创造性的，我在英国读书时，发现英国理论研究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的注经传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学者们在解释经典理论著作时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我在介绍、解释自由主义理论时，当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视角。这些视角或多或少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独特理解。

这些理解与西方人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讨论自由主义时，我特别关注西方自由主义得以发扬光大的社会背景，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赖以运作的外部条件。我以为，一种在文化接受、移植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下发展出的政治理论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理论公开昭

示的原则，而且要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从而揭示这些理论赖以确立的基本预设。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预设某种文化与社会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言而喻、无需讨论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中、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却全然不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讨论自由主义的理论时实际上涉及了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下讨论自由主义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

【杨旭日】你所指的问题裏有代表性的是哪些呢？

【李 强】第一，自由主义是无所不包的（comprehensive）还是有限的（limited）？这一问题涉及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许多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一直认为，自由主义是一套无所不包的学说。人们以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一套关于社会本体的理论，特别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所谓“单子论”学说。这种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倾向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似乎达到顶点。这种理论倾向受到自由主义批评者的不断挑战。从梅斯特尔到麦金太尔，保守主义理论家对自由主义的恒久批评是：单子化的个人削弱了社会的道德基础。面对保守主义以及社群主义的批评，自由主义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罗尔斯的新著《政治自由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反思的新成果。这就是将自由主义的价值限定在“政治”领域，即所谓“政治自由主义”，而在道德观上接受多元主义的道德。这种对自由主义作出理论限定在中国的语境下颇为重要。它有利于理解中国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兼容性，防止将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西化”。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在“内圣”方面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理想至今仍然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中的“内圣”理想最终未能转化为

北大访谈录 II

“外王”的现实。中国文化最终未能找到一种制度设定，来实现一种和谐、进步的社会。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设定。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杨旭日】中国社会有独特的组织原则。您刚才说，把自由主义限定在“政治”领域。那么，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应该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北大访谈录 11

【李 强】对。这是一个在中国的语境下相当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与批评者通常都强调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恐惧，而忽略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联系。譬如，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在为前苏联与东欧设计改革方案时，专注于削弱国家对社会控制，未能顾及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环境，使前苏联与东欧改革弊端丛生，许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便将这些失败视为自由主义的失败。但是，这种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当然，自由主义的基本倾向是限制国家权力。但应该看到，自由主义同时也强调现代国家在构建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与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与自由主义的反国家特征相比，自由主义这一特征不够彰显。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特征是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hidden agenda）。或者，借用 Stephen Holmes 的话来说，它是自由主义埋在土壤下面的（theundersoil）原则。德国 19 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一问题讨论较多，而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讨论较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英国很早便建立起一套能够对外保障国家权益、对内维护司法秩序的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在争论问题时都把这一点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从未意识到有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

我觉得，揭示自由主义在现代国家问题上这一隐蔽的主

题在中国的语境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自由主义的内涵，理解经济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赖以运作的外部条件。事实上，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时，曾觉察到英美自由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局限性，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现代国家问题的关注。不幸的是，这些关注被后来的学者们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歪曲或背离，而不是对自由主义本来内涵的发扬。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外，我也提到在中国讨论自由主义时还必须关注全球化问题，理解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当然，对这一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杨旭日】您从关注西方政治哲学转移到对韦伯研究，反过
来又以韦伯的视野来研究东西方的政治。您认为，韦伯研究
在他的学术工作中占什么样的位置，韦伯学说在哪些方面给
予了他思想的力量呢？

【李 强】我最初在英国读书时专攻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应然”问题，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状态，个人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我转入研究中国近代转型。这时，我发现只有规范性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分析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方法。当时，我读到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论传统》，书中许多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后来，又读了一些希尔斯的书，从他的书中感觉到韦伯的重要性。那时在伦敦也有几个研究韦伯的学者，也听了一些涉及韦伯的课程，但总的说对韦伯的理解是相当肤浅的。当时我很喜欢希尔斯的书，后来去了芝加哥，一打听希尔斯还在世，而且还在开课，十分高兴，就去参加希尔斯的讨论课(Seminar)，开始是旁听，后来就被接受为正式的成员。在希尔斯的指导下，

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韦伯的著作。

我从韦伯的著作中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的知识结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韦伯。我现在已经很难分清楚，我的哪些研究方法受了韦伯的启发。当然，如果要让我梳理的话，那就很多了，比如说，你要看我那本《自由主义》的书就会发现，对个人主义、对民主，特别是现代国家、文化、精神、道德、宗教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理解，都有韦伯影响的影子。从研究方法来讲，主要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法。他是我理解这些问题入门的导师，但有的问题我读了韦伯以后还不够满足，又沿着韦伯继续往下读，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杨旭日】韦伯的著作中有对现代国家理论的精神见解。您

北大新发现

在这方面的独到的观点，是不是受他的启发很多？

【李 强】关于现代国家问题，我在英国研究西方自由主义时，还没有认真思考过现代国家问题。英美自由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国家的恐惧，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管得最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当我开始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的时候，接触到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要建立现代化就需要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现代科层制这一类概念就出来了。

许多人在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和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的时候，都强调现代国家问题。为了理解现代国家，就必须分析中国这个传统国家。过去我们对传统国家有很多的争议，传统中国究竟是管得太多了呢？还是管得太少了呢？是太强了，还是太弱了？对这一问题，我读了韦伯之后，开始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理解是，就统治者的权力不受任何正式的法律制约而言，传统中国国家似乎是很强大、很专断的。但就统治者组织社会、管理社会、为社会经济的运

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言，它是相当弱的。这样的国家无法提供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套政治的、法律的制度作为外在的保障，否则的话，市场经济没有办法发展。这套政治与法律制度只有现代国家才可能提供。

那么，什么是现代国家呢？韦伯强调现代国家是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的机构，这主要是为了比较统一的民族国家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后来，我发现，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在韦伯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譬如，我在读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书（包括他的 *Court Society* 《宫廷社会》和《文明的进程》）时，就发现埃利亚斯对现代国家构建进程的探讨在韦伯的基础更进了一步。埃利亚斯对现代国家有一基本的定义，他称现代国家是 the monopoly of legitimate use of violence（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和 monopoly taxation（税收的垄断），这两个垄断就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埃利亚斯批评魏玛共和国的软弱的政治制度，认为魏玛共和国国家无法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无法垄断税收，导致权力的多中心。那么，是不是国家把所有东西都垄断在自己手中就成了现代国家了呢？绝对不是。德国魏玛时期许多思想家关于 totalstate（即全能国家）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这些思想家们发现，全能的国家可能恰恰是无能的国家，真正有效能的国家是具有有限职能的国家。这种理论恰好和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观点不谋而合，那就是，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分殊（differentiation）基础上的国家。

北大访谈录 11

我之所以致力于探索现代国家的理论，是希望理解现代政治的实质，希望理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希望理解现代世界秩序中国家的作用。当然，我在这方面还只是开了个头，还有许多路要走。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将自己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奉献给大家。

【杨旭日】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在中国有较广泛的影响，他关于宗教、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关注，是不是也影响了您的文化关怀？

【李 强】是的。今天研究韦伯的学者们一直在争论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命题是不是站得住脚，中国文化里面是否能够找出与新教伦理功能趋同的精神因素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研究韦伯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了解他这一方面的观点，另一方面从韦伯这里（我是先读韦伯后读涂尔干的）了解到一些有关宗教与文化的重要观点，这就是今天西方社会理论中关于 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的理论。我觉得，social capital 与 modern state 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市民社会运作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从制度层面来讲，就是 modern state，从精神层面来讲，那么应该说是 social capital。这个问题很重要。最近福山写了一本书叫 Trust（即《信任》，他还写过《历史的终结》，此书已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的核心就讲 21 世纪国家竞争中信任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信任是一种 social capital。在社会资本雄厚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比较低，反之亦然。譬如，在我们国家，为了保证人们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遵守交通规则，每一个红绿灯下都要放上两三个警察。社会要维持正常的交通秩序需要这么多措施的话，就说明这个社会的 Social Capital 比较低，在社会资本较低的社会中，生产同一种东西所需要的有形的 material capital（物质成本）就会比较高。

我研究韦伯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或文本的方式来研究，我只是把韦伯作为我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入门，从他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有时候对他的理论感觉到不满足，我会更进一步地去探讨去思考这一问题。再举一个例